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将弘扬生态文化写入法律文本,并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保护价值、传统知识、居民参与和气候适应等规范中,纳入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化、人文遗迹、文化价值、原有居民、文化遗产等要素。这表明,生态环境法已不再止于污染控制、资源利用和生态系统保护,而开始把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历史意义和公共意义的关系纳入规范视野。生态环境法由此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转向。

这一转向既有深刻的理论根源,也已获得实定法的规范表述。将其置于全球生态治理的视野中考察,更可见其意义所在:文化因素进入生态环境法,并非某一国家的偶然安排,而是人类应对生态复杂性时的共同选择。中国生态环境法以“天人合一”为价值根基,以法典为制度载体,既回应了这一趋势,也为其提供了具有中国文

一、文化转向是保护范围的结构性质展

所谓文化转向,并非在既有的污染控制、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制度之外,添加若干宣示性的文化用语,而是生态环境法保护范围及其价值秩序的结构性质展。

传统法律体系以主体、客体和内容为基本构造。人是权利主体,自然主要作为物或者资源进入法律,二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为权利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在这一结构中,自然之所以受法律保护,通常因其具有可利用的经济价值、生态功能,或者关涉人的生命健康。文化价值即使被提及,也往往依附于财产权、人格权或者公共利益而获得间接保护,难以取得相对独立的规范地位。

然而,人与自然之间并非只有利用和被利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处山岭,既是自然空间,也可能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方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式之所系。人文遗迹承载着历史经验,原有居民保存着世

上接第一版

泉州中院细化重整价值识别标准——企业是否掌握知识产权、稀缺资质?是否属于高新技术、重点扶持产业?是否拥有一定市场份额或品牌知名度?这些标准为法官“号脉”提供了更精准的“刻度尺”。

在标准统一之后,各中院还注重对基层法院的操作指导。福州中院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实务推进会,帮助基层法院解决“该在什么时候移送”“移送标准如何把握”等实务困惑。2026年6月16日,福州中院召开执转破工作推进会,邀请宁德中院资深法官作交流分享,借助外力提高筛查精准度。

宁德福安环澳船舶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是“精准识别”的典型案列。环澳船舶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当地船舶修造行业的标杆企业。公司拥有二级I类钢质船舶生产资质、专属海岸线使用权、外籍船舶维修点等多项行业稀缺资源,配套完整船台、厂房和重型设备。

如果直接清算拍卖,船厂独有的行业资质会彻底失效,多年积淀的产业优势也将化为乌有。该案在破产阶段采用租赁托管模式维持运营,做到“破产不停产”,保住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时,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招募投资人,以市场化方式为“危困资产”寻找“最优归宿”。最终,福建楷航船舶公司高价竞得,承诺追加不低于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改造技术、开拓市场。

今年6月17日,企业完成资产交割,全面复工,此时距离法院受理环澳公司破产申请还不到一年。

“救活了这家龙头船厂,就等于稳住了福安整条船舶产业链。”宁德市发改委营商民营科科长谢望婷说。

上接第一版

黄影颖给自己立下一条铁规:土地确权案件,必赴现场踏勘——卷宗里看不明白的,就去地上看;图纸中对不上的,就用脚走一遍。

带上卷宗和地形图,黄影颖一头扎进连片山林,徒步穿梭山岭沟壑,循着协议书和林权证记载的山麓、溪流等天然地标,逐一核对争议地块的四至范围和权属凭证的界线位置。

勘界现场,人群再度对立,情绪激动,气氛紧张。

黄影颖迅速上前分开双方,单独沟通耐心倾听村民世代耕作、林场长期管护的

编者按 8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法治精神,使法律不仅成为治理工具,更成为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载体。生态环境法典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等千年智慧?如何将这些文化价值转化为确定性的法律要素?该文化转向又有何全球意义?本报特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利红撰文署名文章,敬请关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高利红

代积累的生态知识,特定生态空间凝结着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此类关系无法还原为财产权意义上的人—物关系。

质言之,生态环境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可供人类索取的功能价值,也体现为人类经验的积淀之地和共享知识的载体。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将这些价值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使生态环境法由保护自然之“物”,进一步走向保护人与自然交互形成的“关系”。

据此,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生态环境法是否应当关心文化,而是文化价值如何转化为具有确定性的法律要素。其一,何种历史记忆、传统知识与文化联系应受保护;其二,此类利益究竟归属于特定个人、地方社区、原有居民,抑或不特定公众;其三,受到侵害之后,应当采取何种预防、停止侵害、恢复或者补偿措施。唯有在识别、归属和救济三个方面渐次形成规范,文化条款方能摆脱抽象宣示,成为可解释、可适用的法律规范。

二、文化转向的根源是关系思维进入法律

生态环境法之所以发生文化转向,根源在于其基础思维正由主客二分走向关系性思维。传统法律关系理论以主体对客体具有可支配性为前提,而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其演化遵循自身规律,并不完全服从人的意志。特定人群与生态环境长期相处所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更非“支配—被支配”所能涵括。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以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占有为旨趣,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本质相通、交互互渗:自然孕育和滋养人类,人类亦应以仁爱及敬畏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在这一有机整体观之下,认识自然与认识人本身并非彼此分离的两件事。法律所调整的,也不应止于人对自然物的利用关系,还应涵括人在特定生态空间中形成的历史联系、文化记忆和共同体经验。生态空间由此不再只是抽象的地理单元,而是自然过程与人类生活长期交互形成的复合空间。空间一旦承载了生产、生活、信仰与记忆,便具有了文化意义。

这一变化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已获得规范表述。就立法目的而言,法典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立为总则性目

“执破直通”:有价值的活,该离场的清

在个案筛查之外,福建法院还在探索前置机制——白名单制度。“法官专长于法律,对行业发展、企业经营判断有局限。省高院准备推动有关政府部门建立企业白名单,把符合产业政策、掌握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暂时困难企业全部纳入,享受税收、融资、司法等多重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徐秀平表示。

“执破直通”不只是程序上打通,更是司法理念上转变。”徐秀平说,“对‘僵尸企业’,加速出清,优化闲置资源配置;对有发展潜力的危困企业,尽最大努力挽救,杜绝拍卖了之。”

府院联动:

双向奔赴,共建破产事务办理绿色通道

破产案件从来不是法院“一家的事”,单靠法院内部筛查、案件办理,解决不了企业资产负债重、税务注销、信用修复、职工安置等跨区域难题。福建法院主动对接政府,把过去一事一协调的临时联动,升级为常态化制度协作,成为“执破直通”落地见效的外部支撑。

福州法院建立覆盖60个职能部门的营商环境联动体系;宁德法院联合公安、税务、人社、自然资源局等十余家单位出台8份企业破产配套办理文件,打通跨部门办事堵点。

福建正阳投资公司破产重整案,是府院联动的标杆案列。正阳公司拥有福建首家通用直升机场——闽侯竹岐机场,配备200米跑道、5.5万平方米飞行区、3500平方米航站楼及3000平方米机库,是闽侯县低空经济产业的核心载体。

因投资经营不善,正阳公司陷入债务危

过往。同时,她对照地形图现场比对地界,将尘封数十年的文字记录,一一对应到眼前真实的山林地貌中。

走完整片山林,厘清全部事实脉络后,黄影颖意识到,于巴巴巴的文字说理很难让常年靠山生活的群众看懂。为此,她创新裁判文书写法,将地形图搬到判决书中,并标注了麓口、山脊、水流方向等关键标识,直观呈现裁判逻辑。

拿到图文判决书的村民和林场工作人员,对照图纸一眼看懂了判决内容,双方均服判息诉。

后来,该案成为广西土地确权案件的示范样本。

标,并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此类规范并非仅仅限制人对自然的某种行为,而是要求重新认识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动态化、关系化的法律思维。

就传统知识而言,法典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纳入保护范围,为地方性生态知识、传统医药知识和农耕知识提供了高位阶的规范依据。传统知识往往具有集体性、传承性、活态性和非书面性,难以被以个人创造和权利排他为基础的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充分涵括。将其纳入生态环境法,意味着立法者开始正视知识与生态空间、地方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典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及惠益分享的规定,要求利用者充分尊重知识持有者和有关社区的地位,其规范意义亦在于此:生态环境保护不再只是对自然物的保存,也包括对生态知识的生产者、保存者和传承者的尊重。

就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结合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专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亦将生态保护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知识及居民生活相联系。此类立法表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已不再被视为互不相关的规范事项,而是生态空间整体治理的不同面向。

三、文化转向具有全球意义

生态环境法文化转向并非仅为中国的制度选择。国际公约与多国国内法均已不同程度地把传统知识、原住民文化和地方共同体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立法路径虽然不同,却共同回应着同一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联系,能否以及如何获得法律承认。

在国际法层面,《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第(j)项要求缔约方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及地方社区在传统生活方式中形成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鼓励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惠益;《名古屋议定书》进一步将相关知识纳入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强调事先知情同意与共同商定条件。这些制度与我国法典关于传统知识保护和惠益分享的规范,具有相通的制度关切。二者均不再将传统知识视为可被自由取用的公共素材,而是重视知识持有者和有关社区的主

来,‘僵尸企业’出清的通道就畅通多了,营商环境也清朗多了。”宁德中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王锦熙介绍,这一机制运行以来,已有892家“无产可破”企业通过破产有序退出,释放了大量被占用的生产要素。

多部门常态化制度协作落地后,破产事务办理流程大幅简化,让跨部门协同从“特事特办”走向“常态速办”。“以前政府部门对破产制度不够了解,办理顾虑多。”宁德市市场监管总局审批科科长郑孙锋坦言,“2022年和法院联合出台文件后,管理人拿着法院文书过来,当场就能办理企业注销。”

谢璧婷这样描述这一变化:“这相当于给各部门的经办人员思想上松绑,不用再为‘该不该办’层层请示、步步走流程。”

这种转变,身处一线的破产管理人感受最为真切。福建恒宁清算服务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周敏感慨:“有没有法院联动的文件,简直是两种体验。现在管理人的身份得到各部门认可,办理破产重整相关手续一路绿灯。”

数据显示,依托“执破直通”配套联动机制,福建破产企业账户查询、税务注销等高频事项办理时长缩短三分之二;同步推出的“税破直通”、共益债融资等机制,开辟了破产企业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宁德中院创新县域企业“零失信”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构建“预防—惩戒—修复—退出”全链条失信企业治理体系,2025年,柘荣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失信企业动态清零,形成有宁德特色的县域信用治理样本。

目前,福建法院正推动建立省级层面的破产处置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破产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设改革,统筹解决企业识别、涉税办理、资产处置、信用修复、金融协调、变更注销、职工安置等各类跨域难题,促推“执破直通”机制持续走深走实。

有人问她,经常奔走深山,埋首枯燥法条,累不累?

黄影颖笑答,世事纷扰,唯有守拙方能心定,唯有潜心方能行远。她不过追逐轰轰烈烈的大案,只想默默地将勘案足迹延伸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长年奔走山间实地勘案,黄影颖始终坚守两条准则,“法律适用分毫必究”和“群众诉求尽力疏导”。用脚步还原土地山林真实边界,靠现场释法消解群众对立情绪。

黄影颖常说,行政审判是群众与行政机关之间沟通的纽带,纽带牢不牢,关键看办案人能不能守住法律底线、读懂百姓难处。

办案之余,黄影颖并未停下深耕专业、延伸司法效能的脚步。她发现,工作中缺少一本贴合土地制度发展沿革、覆盖土地确权全流程的实操工具书。为补齐这一实务短板,500多个夜晚伏案,她系统梳理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权制度改革各阶段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体地位。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景观”概念的确立,以及《法罗公约》对“遗产社区”的创设,同样表明法律保护的对象已不限于自然本身或者人造遗迹本身,而是二者长期交互形成的整体,其价值也不再仅仅取决于物的年代、形态与稀缺性,而来自特定群体赋予其的意义与记忆。

在内国法层面,新西兰将旺格努伊河确认为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并赋予其法律人格,其立法基础正是承认河流与毛利人之间存在无法以财产权涵括的历史性、精神性联结;挪威《自然多样性法》则将维护萨米文化所依赖的自然基础纳入立法考量,要求主管机关重视萨米人世代利用自然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前者取法律人格化的激进路径,后者取参与协商的渐进路径,而中国则依托统一法典,将传统知识保护、惠益分享、居民参与等制度予以体系化表述。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转向具有两重意义。其一,就理论根基而言,它并非对国际规范的被动移植,而是以“天人合一”为价值统摄,对传统生态智慧作出的现代法律转化。毛利人的宇宙观、萨米人的传统知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虽产生于不同文化,却共同提示人类,自然不是孤立于人的外在客体,而是人的生活、历史与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三者殊途同归,均指向对主客二分范式的反思。其二,就制度贡献而言,以法典形式集中安排生态文化、传统知识、惠益分享与居民参与,有助于加强价值、原则与具体制度之间的贯通,形成较为融贯的解释体系,为国际环境规范在国内法层面的落地提供了一种更具体系化的技术路径。

当然,文化转向远未完成。传统知识的认定标准、相关权益的归属、原有居民参与程序的效力以及文化利益受损后的责任衔接,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文化价值具有地方性、共享性与流动性,其规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度抽象,文化条款容易沦为宣示;过度确定,又可能把活态文化冻结为僵化的法律对象。因此,生态环境法未来的重要任务,是在开放性与确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在尊重地方知识与共同体经验的同时,逐步形成可识别、可参与、可救济的制度结构。唯有如此,文化转向方能由价值宣示进入规范实践,中国生态环境法也方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文明对话中,提供既根植本土又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制度方案。

来,‘僵尸企业’出清的通道就畅通多了,营商环境也清朗多了。”宁德中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王锦熙介绍,这一机制运行以来,已有892家“无产可破”企业通过破产有序退出,释放了大量被占用的生产要素。

多部门常态化制度协作落地后,破产事务办理流程大幅简化,让跨部门协同从“特事特办”走向“常态速办”。“以前政府部门对破产制度不够了解,办理顾虑多。”宁德市市场监管总局审批科科长郑孙锋坦言,“2022年和法院联合出台文件后,管理人拿着法院文书过来,当场就能办理企业注销。”

谢璧婷这样描述这一变化:“这相当于给各部门的经办人员思想上松绑,不用再为‘该不该办’层层请示、步步走流程。”

这种转变,身处一线的破产管理人感受最为真切。福建恒宁清算服务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周敏感慨:“有没有法院联动的文件,简直是两种体验。现在管理人的身份得到各部门认可,办理破产重整相关手续一路绿灯。”

数据显示,依托“执破直通”配套联动机制,福建破产企业账户查询、税务注销等高频事项办理时长缩短三分之二;同步推出的“税破直通”、共益债融资等机制,开辟了破产企业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宁德中院创新县域企业“零失信”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构建“预防—惩戒—修复—退出”全链条失信企业治理体系,2025年,柘荣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失信企业动态清零,形成有宁德特色的县域信用治理样本。

目前,福建法院正推动建立省级层面的破产处置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破产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设改革,统筹解决企业识别、涉税办理、资产处置、信用修复、金融协调、变更注销、职工安置等各类跨域难题,促推“执破直通”机制持续走深走实。

有人问她,经常奔走深山,埋首枯燥法条,累不累?

黄影颖笑答,世事纷扰,唯有守拙方能心定,唯有潜心方能行远。她不过追逐轰轰烈烈的大案,只想默默地将勘案足迹延伸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件,筛选数千份全国各地裁判文书,形成确权规则与裁判指引,填补同类实务书籍空白。

如今,这本书常摆在广西法院和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许多工作人员的书桌上。

此外,黄影颖多次走进执法单位授课,将勘界、调解、裁判的心得倾囊分享,让公平正义的方法传递到更多基层一线。

有人问她,经常奔走深山,埋首枯燥法条,累不累?

黄影颖笑答,世事纷扰,唯有守拙方能心定,唯有潜心方能行远。她不过追逐轰轰烈烈的大案,只想默默地将勘案足迹延伸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遵循、总纲领、总指引。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对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要求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司法治理效能。

基层法院作为司法体系的“神经末梢”,是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最前沿。当前,基层法院面临党建与业务融合不够深入、队伍作风建设仍有短板、干警素质结构不够均衡、源头解纷质效参差等共性问题。立足新征程,基层法院必须深度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贯彻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要求,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全局、以纪律建设端正作风、以队伍建设夯实根基、以机制创新释放效能,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党建带队建、党纪促效能、实干促发展的基层司法现代化新路径。

以党建铸魂定向,把政治标准转化为司法效能标准

政治建设是党建的根本,也是基层法院提质增效的根本保证。司法效能首先是政治效能,司法作风本质上是政治作风。抓效能建设,必须从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破题,确保司法履职沿正确方向高效推进。

要筑牢思想根基,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有实效。纠治“重台账、轻实效,重摘抄、轻领悟”的形式化倾向,建立闭环式常态化学习机制,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一体抓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规范支部集体学习,坚持学原著、明要义、悟原理,做到有章节、有思考、有落实,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想统一带动行动统一。

要强化政治统领,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牢记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把司法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保障高质量发展、守护民生福祉为效能建设出发点。坚决纠治单高发展、机械司法,把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贯穿立案、审判、执行、解纷全过程,以政治自觉推动履职提速提质提效。

要严明纪律规矩,以刚性约束守牢效能底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党治院要求,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矩和铁规禁令,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审务督察、风险排查。以严明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整治庸懒散拖、敷衍应付、效率不高顽疾,让纪律严、作风实、效率高成为基层法院常态。

以融合破题赋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司法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两张皮”是长期制约基层法院效能提升的最大堵点,破题关键在体系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融合机制,让党建引领可见、效能提升可感。

要构建体系化融合格局。推行“党组统筹、支部主战、干警主责”三级联动机制,以党建品牌矩阵为载体,贯通全院总品牌与支部子品牌,把党建、纪律、队建、审判质效、诉讼服务、源头解纷、营商环境一并纳入年度攻坚清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从制度上解决党建虚化、业务单兵突进的问题。

要深耕实战化一线练兵。把办案一线、网格治理、便民服务作为淬炼队伍、检验作风的主阵地。常态化推进法官进网格、共享法庭、巡回审判、先行调解,组织干警下沉普法、调研、排险,在听民声、解民忧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服务效能。

要推进品牌化赋能增效。依托支部载体设党员先锋岗、效能示范岗、便民窗口,推动党员在积案清理、质效攻坚、解纷便民中亮身份、作表率。以党建品牌牵引业务突破,以支部特色补齐工作短板,实现引领有力、质效提升、群众认可、源头解纷见效。

以育匠强能固本,把队伍素能转化为司法质效动能

队伍是效能之本,人才是发展之基。对照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要求,基层法院须建立系统化、阶梯式、实战型培育体系,破解能力单一、复合不足、青年成长慢、业务参差等普遍难题。

要健全青蓝接续梯队机制。推行“政治导师+业务导师”双导师制,既传办案技能、调解技巧、数字应用,更传纪律规矩、司法作风、为民初心。建立青年干警成长、作风、效能三本台账,助推青年干警尽快成为审判执行与基层治理中坚力量。

要健全以学促干练兵机制。常态化开展业务研讨、案件评查、技能比武、调研交流,紧扣审判质量、效率、文书规范、庭审能力、群众工作短板精准提能,形成学业务、强本领、优作风、提质效的良性循环。

要健全数字赋能革新机制。主动适配数字法院建设,常态化培训智能办案、线上诉讼、数字化治理应用,以科技提简流程、压缩时限、减少冗余。制度规范与科技赋能双向发力,持续释放基层司法高效能新活力。

以严管厚爱聚力,以优良生态保障效能长效提升

全面从严从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底色,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是队伍建设科学方法论。基层法院效能持续提升,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爱的温度不缺位,涵养风清气正、争先创优的政治生态。

要从严治院转作风。紧盯司法作风、办案审限、窗口服务、日常纪律,常态化督察纠偏、苗头预警、闭环整改。以铁纪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倒逼作风向好、履职提效。

要实练导向激干劲。建立政治表现、纪律作风、办案质效、群众评价、解纷成效综合考评,打破唯数据论。以实绩论英雄,将考核与评优晋升、骨干培养、岗位历练挂钩,激发内生动力。

要暖心惠警聚合力。常态化谈心谈话、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精准落实减压释负举措。以组织温度凝聚向心力,引导干警尽责担当、实干担当,以过硬本领高效履职护航高质量发展。

党建强则队力强,作风实则效能优。新时代基层法院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党建、关键在队伍、核心在效能。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以纪律建设为抓手、队伍淬炼为支撑、融合赋能为路径,推动党建与审判执行、司法服务、源头解纷、队伍管理深度融合,方能系统破解效能短板与治理弱项,形成“党建引领有力、纪律作风严实、队伍素能过硬、司法效能提升、基层解纷高效”的常态格局,为人民法院工作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

(作者单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

党纪凝心铸铁军 党建赋能提效能

黄为民 钟岩伟